

# 揮淚別金華

黃大受

英士大學，成立於民國二十八年，是蔣介石，為紀念革先烈陳英士而定名創立的，校址設於浙東。民國三十一年，改為國立，勝利後，校址確定設於金華。分文理、法、農、工四學院，學風刻苦樸樸，學生一千多人，以浙江、江蘇、江西三省學生佔多數。

勝利以後，中共為擴大勢力，顛覆國民政府。共謀學生，在各大學煽起學潮，僻處山鄉的英大，到三十七年秋季，才受到影響。潛伏的共謀學生，以工學院較多，農學院次之，文理學院較少。法學院由於先後任教的徐東藩、曾繁康、劉光藩、陳長蘅……等教授都是忠貞愛國之士，教學認真，獲得學生擁戴，所以法學院的共謀學生無法活動。相反的以法學院為主的反共學生，在主持課外活動的張致祥教授指導之下，和共謀學生競賽，辦壁報、論文、演說比賽、演話劇、辦歌詠團……等活動，使得左傾勢力，只能局限在工學院內，發生不了多大作用。那時，各大城市的共謀學生，正在鬧「吃光運動」的醜劇，社會上正義人士，莫不痛心蹙首。英大的共謀學生，多次要響應這一醜劇，卻始終鬧不起來。

民國三十八年初，政府軍事失利，戰火由北而南，到了長江北岸。北方最後的兩個大城——

天津、北平，相繼淪入匪手。蔣總統介公又在一月二十一日引退，中樞頓失重心，政府對中共進行和談，長江以南的各大學，更是動盪不安。尤以京滬杭的大學共謀學生囂張，一般學生無法安心讀書，甚至達到無法上課的地步。英大的校長湯吉禾辭職，由鄧傳楷先生繼任；這時擔任行政首長，真是萬分棘手，通貨膨脹，物價日漲，全校師生在生活不安的情況下，居然如期開學上課，真不容易。

從二月下旬到四月，上課一個多月，擁護政府的師生，天天注視和談的演變。而共謀學生則是天天騷動，製造糾紛，想造成停課的局面。當時筆者在英大，除了教授中國政治史、中國外交史……等課程外，特別開了一門「中國政治問題」，講授如：「暴政」、「流寇」、「民族」、「民主」、「法治」……等幾個專題。指出暴政必亡，流寇必滅，鼓吹民族大義，應該爭取真正獨立，要發揚傳統的民主精神，闡述國史上法治的真諦。表面上從歷史來討論政治問題，實際是暗示中共的所作所為，並不適合中華民族，最後必然會消滅的。當時政治系三年級學生只有十多人，然而來旁聽的卻有二十多人，（那時各大學每系每年級不過數人或一、二十人），是否選了

此課？筆者也未追究。筆者相信，其中大部份是他學院前來的共謀學生。幾乎每週二小時的講演，常為許多學生提出的希奇古怪的問題，扯個不完，以致延遲下課。好在這些共謀份子，大多是工農學院的學生。他們對社會科學及歷史並非所長，口才也不見得高明，無法難到筆者。只有在黑板上寫幾個「保皇黨」的字樣，表示不滿，筆者只有付之一笑而已。

當時筆者年少氣盛，認為邪不勝正，根據大是大非及大無畏的態度侃侃而談，獨來獨往。雖然為共謀學生所痛恨，但是在金華治安未紊亂之前，這般共謀學生，一時也不敢下毒手，何況筆者特別小心，晚間決不單人外出。不過他們在民國三十七年，曾經把訓導長趙希猷打跑，使得沒有教授願任此職，訓導長竟虛懸了一年多。在和談時期，共謀學生經常聚會，也不來上筆者的課了。偶而傳出謠言，共謀學生要和城外的土共合作，在城裏製造暴動，令人有一夕數驚之感。

四月中，師生的情緒，都很低落，上課遂不正常。四月十五日，中共提出最後通牒，黨政人士均加反對，和談中止，共軍渡江，在所不免，小部份師生請假回家，已成半停課狀態。由於政府遷往廣州，經費領取不便，而幣值

日落，生活艱難，筆者與反共的教授數人，力勸鄧校長傳檣赴廣州洽領經費。四月廿二日，鄧校長離金華往上海轉廣州，校務由教務長葛定華先生代理。這時軍運忙碌，火車班次，已不準時，東來西去的人，擠滿了車廂，不買票的人，自行上車，車站的秩序，已無法維持。

四月二十三日，共軍渡江。南京等地相繼陷落，英大的共謀學生，散佈謠言更兇，自然無法上課，金華附近的學生，回家的更多。在如此情形之下，反共的學生，勢非離去不可，家在江蘇、浙西、安徽的，已是有家歸不得。這時筆者與張致祥兄及少數反共的教授研究，主張集體南撤廣州，追隨政府，而且鄧傳楷校長已有同樣的意見，並且囑張兄做領隊。但要秘密行動，以免發生意外。最困難的是交通問題，因為金華是中途站，由杭州開來的火車，無不塞滿車廂，少數人或許可以擠上去，想南撤二三百人，實在無上車的可能。

幸而筆者在金華，認識了幾位火車站的工作人員。這時，南撤的人員，如果由英大備公文去交涉車輛，未必能有辦法，而且有走漏消息的危險。筆者只得去請火車站的朋友設法。他們深明大義，願意幫助。他們說：「金華站要上車的人太多，也無空車廂可以調撥。好在金華是個大站，現在又無貨運，只有設法調配貨車！」經他們的努力，調了三節無頂的貨車，預先停在遠離車站的車道上，等火車來到，再連結上去。但是由杭州開來的火車，何時來到，却毫無把握。因為集體行動，怕共謀學生知道來搗亂，於

是秘密口頭通知，都在四月二十五日傍晚，先後分別上車，不少職員的眷屬，也一道南撤。好在文理法學院學生宿舍與農學院學生宿舍，分隔很遠，行動不大惹人注意。為了保密起見，一時無法普通通知，所以工農學院學生上車的人數不多。總計上車的只有一百多人，比預計的要少，行政人員因要留守，不能離去。於是由張致祥教授領隊。晚上十二時前後，忽然天降大雨，大隊在做車裏無從躲避，又不敢下車，個個都像落湯雞似的。到深夜二、三點，火車才到，把三節做車，連結上去，慢慢地向西開行。車上的人，才把心放下來。至於筆者和另外幾個同仁，不但沒有隨這次車走，反而在大街上來來往往，故意讓經常監視我們的共謀學生看到，以免他們發現大隊南撤的秘密。

過了兩天，秩序更壞，已無上課之可能，筆者和幾位同學，也千辛萬苦的擠上火車。當時想起那年那月，才能重臨此土？國事如此突變，令人感嘆，不禁洒下了幾點熱淚！

這列火車，不但車廂中擠滿了人，車頂和機車上也黏滿了人，走走停停，從四月二十八日到五月一日，足足走了四天三夜才到南昌。沿途秩序已亂，飲食也買不到，陷於饑餓狀態。筆者疲憊不堪，暫時回家休息，再行設法南下。後來在八月間步行離開共區，到達廣州，再轉來臺灣。

至於西去的那三節車廂的英大同學，在南昌、樟樹換了兩次做車，費了十整天，一路上餐風飲露，不少人病倒了，在五月二十五日，到達廣州。沿途也有不少學生下車回家。六月三日，正

當舊曆端午節的前一天，這大隊剩下的一百餘人，由鄧傳楷校長的照拂交涉，免費搭上撤退的招商局海宿輪在六月六日到達基隆港，登上復興基地的寶島，集體投入了反共復國的陣營。三十二年後的今天，在臺灣的司法界，不少英大的同學，成爲後起之秀，有很大的貢獻與成就。

至於金華英大，則在民國三十八年五月七日下午，共軍進入金華之後，而停辦了。一部份同學，在當天上午隨李延年部隊向西撤退。有些家在附近的職員和同學，上山組織游擊隊，直接從事打擊中共的工作，以後的情況不得而知。共軍進城以後，來不及離開的師生，有的被中共公審就義和下獄。最壯烈的，是法學院院長兼政治系主任徐東藩先生，他是金華人，被捕下獄。他痛罵中共禍國殃民，必將滅亡，中共要設法磨折他，防他自殺，但他竟打碎飯碗，用磁片刺喉，流血而死，大節凜然。這許多位爲國就義的師生，實在是英大之光，更增加同胞對毛共的痛恨和滅共的決心。歲月如流，轉瞬已是民國七十年，大陸上中共目前混亂的情勢，日甚一日，中共政權崩潰之期，已不在遠。大陸光復以後，必能重建英士大學，以慰死難烈士之靈，發揚中華民族正氣。（選自時代文摘）

訂閱「時代文摘」，「中外雜誌」請撥電話七〇七二四八〇